

GUIZHOU
SHEHUIKEXUE

贵州社会科学

● 经济社会版



1988.3

No 1-12

1988/1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历史考察》出版征订

由周成启、李善明、丁冰合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历史考察》最近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专题理论史著作，为经济学说史编写方法的一新的探索和尝试。全书共分绪论及对象论、方法论、价值论、货币论、资本论、工资论、利润论、利息论、地租论、再生产论、危机论十二章，对上至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下至近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以理论专题为单位，分别论述了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全书论述比较全面、客观和严谨，并且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产阶级各家各派的经济理论作出正确评价和比较，不失为一本较好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教学和研究的参考读物。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为本书作序，评述此书在写作上的创新。

需本书者可向当地新华书店订购，亦可直接向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公司购买。

编辑出版：贵州社会科学编辑委员会

地址：贵阳市黄家井 电话：28566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印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CN52—1005）

国内总发行：贵阳市邮局

本刊国内代号：66—13

国外代号：BM456

国内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定价：三角五分

目 录

学精 习 和 贯 彻 十 三 大 神

-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 本刊评论员 (1)
- 改革开放给贵州经济注入生机
..... 陈 琳 高春生 王成章 (4)
- 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重要特征和历史必然..... 石 争 (7)
- 谈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周成启 (10)
- 坚定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胡雄杰 (13)
- 试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 康明中 (16)

- 关于贵州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 扈 伦 (19)
- 经济增长模式与产品质量问题..... 郭克莎 (24)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模式之选择..... 沈玉良 (28)
- 我国城市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 陈建国 (32)
- 试论“两权分离”的关键..... 黄树东 (38)
- 黔东南旅游资源开发探讨..... 保继刚 戴金荣 (41)
- 研究《资本论》第四卷的意义
——《〈资本论〉第四卷研究》序..... 宋 涛 (46)
- 封面设计..... 石俊生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A monthly

No.1 January

Contents

Study of the Documents of the 13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Great Practice Needs Great Theory <i>the commentator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i> (1)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Effectiv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izhou <i>Chen Lin, Gao Chunsheng, Wang Chengzhang</i> (4)	
Developing a Diversified Economy i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Historical Trend on China's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Shi Zheng</i> (7)	
On the Diversified Distribution Patterns Composed Mainly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i>Zhou Chengqi</i> (10)	
Push the Reform Forward Steadily..... <i>Hu Xiongjie</i> (13)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i>Kang Mingzhong</i> (16)	
* *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djustment of Industry Structure in Guizhou <i>Hu Lun</i> (19)	
Th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i>Guo Kesha</i> (20)	
The Choice of the Models Combining Plan with Market o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Sheh Yuliang</i> (28)	
Rational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Cities..... <i>Chen Jianguo</i> (32)	
The Key to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i>Huang Shudong</i> (38)	
Inquiry into Develop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in Southeast Guizhou <i>Bao Jigang, Dai Jinrong</i> (51)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he Fourth Volume of "Capital" —The preface to the STUDY OF THE FOURTH VOLUME OF 'CAPITAL'..... <i>Song Tao</i> (46)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

本刊评论员

赵紫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间十亿人民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制定了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这个报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指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和传播真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对于指导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赵紫阳同志所指出的,当前,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是我们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并加以科学的阐述和概括以指导实践,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要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生活、实践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投入到蓬勃发展的改革实践中去,才能不断地探索真理,认识真理。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回顾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两历史飞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开创了一条新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靠的也是实事求是。党的十三大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反之,如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就是滋生错误的路线、政策、理论的主要原因。过去,曾在长时期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观脱离客观,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作

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才能概括出科学的理论观点,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工作者都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这个最大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我们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摸索,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逐步弄清了我们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个时期,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牢牢掌握和认识这个最大的实际,就会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事业面前,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依据,即在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这样,在我们对丰富、生动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时,就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特点。比如说,当我们进行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研究时,由于明确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能够加深对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理论的理解,而不致于产生否认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或盲目取消公有制以外其它经济成分的观点。因为前者否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后者则忽视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根本特点。

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进行理论研究,其核心是要探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标准。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标准,就会忘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在经济领域里继续搞“生产关系的不停顿革命”的那些“左”的做法;如果没有生产力标准,我们就会犯主观唯心论,主观随意性的错误,似乎可以任意推进历史的发展阶段。所以,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理论工作者要紧密联系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工作。如果离开生产力标准,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式来裁判生活,来进行理论研究,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探索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运动过程。为了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当克服墨守成规、停滞不前的僵化观念。要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如果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就会扼杀其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就会在实践中造成重大的失误。马克思主义一再告诫人们,生活比任何公式却更加丰富,生活之树常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方法,对我们永远具有指导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会为各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编程序或者事先配制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临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大无畏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许多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不断涌现,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列举的一系列新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崭新的一页,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我们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以敏锐的目光注视实际,善于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进行开拓性理论研究的主要保证。要鼓励和支持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辩。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要善于在争论和比较中,完善自己

的学术见解。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要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已被实践证明错误的理论观点。应当看到，在理论研究中，认识上的偏差是难免的。同一个人，在一种情况下有这方面的片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能有另一种片面性。不要把思想一时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说成是僵化，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人们对于复杂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因此，博采众长、取长补短，让不同学术观点、流派争辩、交锋，是繁荣社会科学事业的必由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证明，许多富有创见的科学论断，就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反复地探讨、争辩而逐渐成熟起来的。

党的十三大通过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进行理论探讨的根本指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是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理论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的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缺一不可。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失去根基和保证；离开改革开放讲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旧体制上去，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获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这两个基本点，使理论研究的方向沿着党的基本路线前进。

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为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广大理论工作者任重道远，前途灿烂。让我们勇于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为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理论！

• ~~~~~ •

（上接31页）

设想，可见，模式Ⅳ到模式Ⅶ不适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模式，而板块结合模式本身具有内在矛盾、兰格模式在实际执行中的困难也不应成为我们选择模式的对象，唯有布鲁斯的“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模式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借鉴的目标模式。但我认为，并非其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都毫无用处，应吸收其他模式的优点，如锡克的“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调节”模式强调国家要控制收入分配，因此认为工资也应由国家规定。锡克分析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从需求方面进行控制也是经济稳步发展的条件；又如“参数调节市场”模式，如果不是对所有商品而是对部分商品不直接规定价格，而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商业政策以及国家通过直接的投资活动等影响市场价格，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责任编辑：龚晓宽〕

注：

① O·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10---16页。

② F·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第10页。

③ 同上，第143页。

④ 奥塔·锡克《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效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171—180页。

⑤ 荣敬本等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论著选辑》第280页。

⑥ 参见B·Horva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第500，501页。

⑦ 资料来源：朱嘉明、吕政著《现实与选择》第260页。

⑧ 资料来源：《计划经济研究》1986年第9期。

改革开放给贵州经济注入生机

陈琳 高春生 王成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同全国一样,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从贵州实际出发,围绕发展商品经济这个主旋律,调整生产关系,调整经济结构,狠抓基础建设,使我省经济在基础差、水平低、速度慢、后劲弱的情况下奋起,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变化和发展。

一、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九年来,由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我省国民经济各部门分割、失调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开始出现了比较协调、合理、配套发展的局面。农轻重比例由1978年的40.9:19.5:39.6变为1986年的43.7:23.6:32.7。农业和轻工业得到加强,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工业的状况基本扭转,第三产业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善,经济实力有较大增长。1986年全省社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和城乡人民的平均收入等主要指标都比1978年翻了一番,预计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80年增长一倍多,提前实现第一个翻番,全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的经济政治形势。

二、打破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方针。九年来,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省长期形成的单一的所有制经济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全民、集体、个体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好势头。尤其是个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相当活跃。1978~1986年,在工业方面,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产值占全社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1.2%下降为76.6%,集体、个体和其他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由18.8%上升到23.4%;在商业方面,全民、集体商业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不包括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的比重分别由56.6%、43.1%下降为43.8%、32.8%,而个体商业零售额所占比重由0.3%猛增到23.4%。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贵州资源的开发,加快了基础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扩大了就业面,给贵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三、农村经济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我省农村改革起步较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完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统购派购以及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项改革,农村经济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1986年农村社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2倍,年平均增长10.6%,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一是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它们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6.4%上升到1986年的26.5%;二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增长幅度一个比一个高,趋向协调合理发展。1986年与1978年比较,种植业增长35.6%,林业增长64.5%,牧业增长1.4倍,副业增长1.9倍,渔业增长2.1倍,林牧副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由30.1%上升到44.3%;三是主要经济作物大幅度增长,1986年油菜籽产量达到36.7万吨,比1978年增长4倍,八年总产量比前二十六年总产量还多45%,烤烟产量达到19.2万吨,比1978年增长1.4倍,八年总产量比前二十六年总产量还多50%。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率有较大提高,全省农副产品商品率、农村工农产品商品率分别由1978年的29.5%和33%提高到1986年的37%和44.1%,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由

3.72亿元增加到14.59亿元，增长2.9倍。

四、工业生产获得了新的活力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出和深入开展，由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发展到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多种承包责任制，改革单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引入市场机制，大大增强了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1986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不含村及村以下工业）为85.4亿元，比1978年增长1.1倍，每年平均递增9.8%，按可比价格推算，八年工业总产值累计约比前二十六年累计还多40%。主要产品产量有较大增长，尤其是原料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增长突出。1986年与1978年比较，钢材增长3.3倍，生铁增长1.6倍，原煤增长53%，发电量增长99.2%，焦煤增长94.9%，水泥增长88.9%，饮料酒增长4倍，卷烟增长2.8倍，电视机增长67.2倍，洗衣机、电冰箱从无到有，填补了空白。从经济效益看，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百元资金实现利税、百元产值实现利税、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84.4%、60.3%、24.5%、62.8%，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216天变为164天，加速了52天。一批优质产品荣获国家和省级奖励。

五、城乡市场空前活跃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以及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缩小了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统配物资、市场计划商品的范围，对商业管理体制、市场商品流通渠道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成份、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多功能的市场机制，城乡市场空前活跃，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上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1986年与1978年比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倍，农民对非农业居民出售农副产品额增长4.1倍。各种商业机构增长5.5倍，其中零售商业机构增长5.8倍，零售商业人员增长2.3倍。全省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发展到了2424个，集市贸易成交额增长3.8倍，并建立了物资贸易中心10个，钢材市场4个，生产资料商品市场逐步建立，资金、劳务、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也正在生成。

六、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项国策。九年来，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我省经济受益非浅，据不完全统计，我省先后与28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横向经济联系，从省到乡，从地方企业到军工企业，从经济部门到科学教育部门都敞开了对外联系的大门，在特区、沿海和其他省区设立了生产、经营、信息“窗口”200多个，引进资金2.2亿美元，引进技术900多项，引进人才3500多人次，办成多种协成项目1000多项，协作进出物资总金额14.3亿元。与此同时，积极对外开放，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外贸进出口总额八年增长5.9倍。至1987年10月止，已签订中外合资、合作项目23个，国外贷款5项，补偿贸易11项，总共可利用外资4488万美元。此外，在省内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横向经济联合体正在形成，全省建立了多种经济联合组织430多个，促进了生产要素优化组合。

七、运输邮电事业蓬勃发展 在改革中，运输邮电事业得到了加强和发展，1979~1986年，全省累计用于运输的投资达4.6亿元，贵昆、川黔、湘黔三条铁路电气化改造全面施工，贵阳到水城、贵阳到凯里电气化改造已竣工通车，新建公路2240公里。全省客货运载汽车拥有量至1986年底达6.55万辆，比1978年增长1倍，其中个体私车5528辆。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平均每年递增11.1%，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1986年比1980年客运周转量增长1倍，货运周转量增长85.6%。在运输业发展的同时，邮电通讯事业也有较快发展，长话电路、电报电路、城市电话、邮电局所等都有不同程度增长，代办业务逐渐扩大，全省邮电业务总量每年平均递增11.1%。

八、教育科技事业欣欣向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教育和科学技术当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来抓,1979—1986年用于教育、科研、卫生的投资共10.5亿元,较三中全会前二十六年的累计额增加2.5倍,其比重由2.1%提高到13.9%。在此期间,除普通教育得到加强外,高等和中等教育取得了突破性发展,1986年比1978年,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增加近一倍,中等专业学校在校人数增加一倍多。科研机构在改革中扩大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围绕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科研—生产“三结合”的科研体系,取得了一批适用、高效和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科研成果。自1980年以来,经省科委评审登记的科研成果累计达1896项,其中获奖1018项,分别比前二十八年累计增长87%和5倍多。

九、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得到了实惠,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和改善。1979—1986年,城镇安置就业总人数91万人,待业率由6.3%下降到3.1%。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1978年的655元增加到1986年的1297元,增长近1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用由265.68元增加到741.96元,增长1.8倍,扣除物价上涨指数,平均每年递增10.2%。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09.3元增加到303.6元,增长1.8倍,人均生活费支出由104.27元增加到271.95元,增长1.6倍,平均每年递增12.8%,是前二十六年递增3.3%的3.9倍,73%的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户生活也有改善,1978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元的农户占70%以上,1986年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户只占18.9%。随着城乡人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趋向营养、中高档、漂亮、舒适,吃的比重相对下降,穿的、用的比重上升,居住条件有所改善。相当部分人的货币收入用于生活、生产支出外有节余,1986年末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2.2亿元,比1978年增长11倍,加上居民手存现金达30多亿元,按全省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节余100多元。

十、基本建设成就明显 由于计划体制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促进我省基本建设投资改变了靠国家拨款的单一形式,实现了投资来源多样化、投资经济成份多种化、投资方向合理化,投资效果逐步提高。1979—198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162.3亿元,比前二十六年基本建设投资还多21.37亿元。在162.3亿元投资中,全民所有制投资117.6亿元,占72.5%,集体所有制投资8.4亿元,占5.1%,私人投资36.3亿元,占22.4%。八年新增固定资产134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82.6%,比前二十六年提高23.4个百分点。全部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项目7153个。新增生产能力主要有:炼钢30万吨、精轧钢20.5万吨、发电装机93.4万千瓦、采煤204万吨、电解铝8万吨、水泥69万吨、平板玻璃48万箱、电视机26万台、洗衣机20万台、电冰箱5万台、卷烟86.9万箱等。农业、运输业、教育、卫生、住宅等方面都有一批项目相继建成。基本建设的有效投入为我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实力。

九年来,我省的经济与建设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与全国比较,发展不算快,与经济发达省市的差距很大。主要存在问题是:人口增长过快,部分地区温饱问题未解决,劳动者素质差,技术、管理落后,人才、资金缺乏,粮食生产回升乏力,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质量差,市场竞争力弱,投资环境欠佳,对外开放缺乏吸引力,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等。这些客观和主观因素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制约很大。我们必须在九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掌握十三大精神,密切联系贵州实际,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和基本要求,紧紧地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快和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继续完成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任务,努力实现第二步任务,逐步改变贵州落后面貌。

〔责任编辑:张培梓〕

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历史必然

石 争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意思。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根据这个科学的论断，提出了“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这是初级阶段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正确领会，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一）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是为中国特有的国情所决定的

我们不应当忘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脱胎而来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这种状况就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国情。如果我们脱离这种特有的

国情，我们就要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重犯历史上企图用拔高生产关系的办法而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记忆犹新，我们饱尝了“大跃进”所带来的苦果，蒙受了“十年内乱”的那场灾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优越性，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并且危及了党的形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正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航向，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真正结束了长期执行的“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的错误指导思想，使生产关系适应了现有的生产力状况，调动了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农村从此产生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仅仅用了九年时间，国家的面貌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都体上翻了一番。十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部分地区，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全国城市新就业的人数达到七千万人，有八千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业产业。市场供应已基

本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显著改变，逐步转上大体协调发展的轨道。面对着这些事实，我们应当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如果不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在工业企业先后实行经济责任制、经营承包责任制和租赁制等，不积极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不允许私人企业的发展，不允许象企业集团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联合体的存在，不允许外资在中国兴办企业，不允许试行股份制，一句话，没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发展，这种最好时期则是不会出现的。由此可见，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规律的要求，是我国完成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科学道路，是实现我国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正确途径，是最终使我国摆脱贫困、落后，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起来必需的条件。因此，坚定地、积极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应是我国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奉行的一项根本国策。

（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并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谈到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担心，怕由此改变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报告中已经肯定地指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又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它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在这里已经明确的阐明，第一，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将始终居于主体地

位。第二，从目前看，不仅作为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还远远不够，就是集体经济也是发展得很不够的。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要想把商品经济加速发展起来，中外的现有经验已经完全证明，光靠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光靠全民所有制经济孤军作战，是不可能办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全民、集体、个人一齐上，同时，还应该认真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并发展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我国只有走这样一条道路，才能尽快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没有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我国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分析了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后，不妨我们再分析一下它的发展趋势，看看是否会因为多种经济成份发展带来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后果。我想，中国人民谁都清楚，目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要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所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加在一起也只占百分之几。同时，在我国土地已经实行了公有制，矿山、河流、铁路、公路、邮电、银行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经济因素都掌握在国家手中，现在我国拥有的轻重大型企业也都几乎全部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其它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发挥它所能起的作用。非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份的这种补充作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国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犹如任何潺潺细流决不会代替长江、黄河一样，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是不可能“喧宾夺主”的。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不会因为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而有所改变。

(三) 发展多种经济成份 不会导致两极分化

对于发展多种经济成份除了怕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有另一种担心,就是怕导致两极分化。特别是在看到出现了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经济成份的时候,更会产生这种顾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经历了漫长剥削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剥削制度,进入了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由于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允许私营经济成份有雇佣关系存在,联想到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产生忧虑则是自然的。但是,存有这种忧虑的同志必须看到另一个重大的事实,就是今天雇佣关系的出现,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有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由此可见,这种新出现的雇佣关系与旧社会的雇佣关系是不相同的:第

一,在旧社会条件下,它是剥削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形成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已失去这些特有的作用,只能作为社会主义附庸,起着补充的作用,不能对社会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国家,要制订一套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除了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也加强对他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从而就有效地限制了它们从事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行为。第三,虽然由于雇佣关系的出现,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并包含他们的部分风险补偿,但都必须在合法条件下取得,雇佣关系已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扩大非劳动收入。在这里,我们更应充分估计到庞大的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引导和制约的作用,以及信贷、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一定数量的雇佣关系,是不足为害的,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总之,权衡利弊,为了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商品经济,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宏伟壮丽的事业,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种经济成份,是一条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科学的国策。

〔责任编辑:张培梓〕

• ~~~~~ •
(上接23页)

于贵州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样做,国家应当在计划、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或优惠,在产品、利润、外汇等方面给予照顾。

5.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完善中央和省两级调控体制。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在我国现阶段,单靠市场的作用,单靠企业、地方、部门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作到的,必须运用一系列调控手段,包括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进行干预,才能既促进竞争,又防止竞争带来的破坏,保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建立和完善中央和省两级调控决策体制,是贯彻实施产业政策,综合运用调控手段的组织保证。当前首要的是中央要适当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份集中,要扩大省市一级的决策权,使地方能够综合运用计划、财政、信贷、税收、价格等手段,按照产业结构的客观运动规律,按照国家和地方利益兼顾的目标,主动灵活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责任编辑:张培梓〕

谈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周 成 启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是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这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决策。

经济体制改革所以要提出这项任务、实行这项重要决策,是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的。由于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因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要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只靠发展公有制一种经济,还应该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经济等,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相适应,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也必然具有多种形式。除了按劳分配这一主体形式外,还有按经营成果分配,按资金分配(如利息、股息、红利等),按资本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等。由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有利于当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它是进步的、合理的。实行多样性的分配形式,是形势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人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往往只承认按劳分配,一提起按资金分配,或者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或者允许非劳动收入,就往往摇头。认为实行按劳分配是天经地义,实行其他分配方式是大逆不道。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更新的陈旧观念。问题在于:一种分配方式合理还是不合理,正确还是不正确,可行还是不可行,不能从抽象的道义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凡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应该认为是进步的,必须加以提倡;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应该认为是落后的,必须加以废除。我国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因适合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生产发展,因而日益显示其优越性。可见,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就是打破旧框框,以一种新观念来代替一种旧观念,就是一种观念更新。

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在理论上也是一种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最初设想的理想社会,当然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在《资本论》特别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未来社会存在着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①这里马克思阐述的就是我们平常所熟知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马克思没有预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除“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以外,还可以有其他

的分配方式。所以，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是我国根据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另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按劳分配，是以生产资料全部为社会所有，不存在商品经济，不存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全社会实行统一的计划，劳动者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是直接的社会分配为前提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这种状况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能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所作出的对未来社会的预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不能不说是后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个突破，一个发展。

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是必然的，而且客观上已经存在。在我国，当前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分配方式：

一、按劳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主要存在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这两种所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基本上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是复杂劳动高于简单劳动、繁重劳动高于非繁重劳动、熟练劳动高于非熟练劳动。但是，应该指出“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现象还广泛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还到处可见。因此，即使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也还不是彻底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说，存在着按劳分配的不完全性。至于有的地区在一定时期中出现的拿手术刀的人的工资还不如拿剃头刀的人的工资高这种工资“倒挂”现象，则更是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

二、按经营成果进行分配 这种分配形式多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但全民所有制企业也要受这种分配的影响。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间实行等价交换，企业本身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因此经营成果好的，它获得的利润就愈多，职工工资就愈高（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集体福利等也就愈多。这就是说，由于经营成果不同，劳动者从事同一种工种的劳动，付出同样多的劳动，在甲企业和乙企业，所取得的实际劳动报酬，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按经营成果进行分配，既有按劳分配的因素，也有非按劳分配的因素。说它有按劳分配的因素，是说经营成果与职工的劳动态度、劳动效率，与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分不开的，一般说来，愈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愈能取得较好的经营成果。但是，决定经营成果的还有其他因素：生产条件、经营管理水平、价格体系、市场状况等等。生产条件好的企业，例如规模大、资源丰度高、设备先进的企业，往往劳动生产率就高，生产费用就低。其产品的个别价值往往低于社会价值。由此就产生超额利润，获得级差收入，从而劳动者也可能获得较多的劳动收入。这种较多的劳动收入，不是因为劳动者付出了较多的劳动，而是因为该企业的生产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经营管理水平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果，也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多半与企业领导人员的素质有关，而与企业职工付出的劳动量关系较少。因此，劳动者在不同的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中劳动，获得的经营成果从而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可能是各不相同的。这也不是由劳动者付出的不同劳动量所引起的。至于价格体系对经营成果的影响则更为明显。由于我国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固定价格，而这种固定价格有的又明显的偏低（如煤），这就使得这些企业不但不能赚钱，而且还要亏本。这种经营成果（亏本），不是由于这些企业的劳动者劳动得不好所引起，而是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所造成。正因为这样，所以对目前的价格体系要进行改革。市场对经营成果的影响也为人所共知：商品畅销可以使企业赚大钱，商品滞销、商品价值不能实现可以使企业少赚钱甚至亏

本、破产。这也与企业内劳动者的劳动无关。总之，按经营成果进行分配，既可能与劳动者的劳动有关，也可能与劳动者的劳动无关；既可以体现按劳分配，也可以不体现按劳分配。

三、按资金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主要存在于合资经济、股份企业中。合股企业（有国家和集体合股，集体和集体合股，国家、集体和个人合股等）有股息，合资企业（有地方合资、中外合资等）有红利。但是它们都是按资金的多少进行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此外，存入银行的资金还有利息。利息量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存入银行的资金量，因此也可以说是按资金分配。在中外合资企业，外国企业主获得的红利，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带有剥削性质，但由于它在现阶段对发展生产有利，因而为国家法律所保护，其存在是容许的。

四、按资本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主要存在于私营经济（其雇工数多时可达千人）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在这里，生产资料是资本，劳动力是商品，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态，不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获得的劳动报酬。因此这里存在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存在着劳动者为企业主、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不完全相同，因为不论是私营经济，还是外商独资经济，它要受社会主义国家的限制，受国家的宏观计划的控制，遵守国家法令，其职工的工资也要受按劳分配规律的影响，受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经济，看起来由于剥削的存在，很不合理，但对发展生产有利，因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也是允许的。

五、个体经济获得的劳动收入 恩格斯说：“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创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①。所以这里不存在收益的分配问题，只存在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的自食部分和剩余部分的区分。生产者和分配者是同一主体。目前在我国城乡，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个体户，他们靠劳动谋生，或者提供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劳务，既不存在剥削别人，也不存在受人剥削。他们的全部产品和经营收入都是劳动收入，因此应该受到尊重，但这不是按劳分配。农村中的家庭承包经济，部分性质类似上述个体经济，属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由上可见，由于我国目前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股份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经济、个体经济等，因而与此相适应，在分配方式上也必然是多种分配方式，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体分配方式外，还有其他多种分配方式。这是为我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为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国情所决定，因而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必然性。

〔责任编辑：龚晓宽〕

注：

①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4、12—13页。

②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坚定地改革推向前进

胡 雄 杰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的长远指导方针，他说：“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特别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九年间，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绚丽光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我们靠改革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国经济建设战略任务的第一步，今后，我们仍然要靠改革，去夺取第二步、第三步的新的更大的胜利。

加快和深化改革，是党的十三大的主题。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是迅猛发展的时代提出的紧迫要求。怎样加快和深化改革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阐明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在这一系列的论述中，一个突出的中心点是生产力。这就是说，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一条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检验改革的成效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足以使初级阶段宣告结束，才能步入较高的一级阶段。这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努力的过程。然而，严重的教训是，我们过去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只注重变更生产关系，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次要的地位，急于求成，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以为越“大”越“公”越先进，大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通过改革，开始打破旧的僵化模式，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已经开始建立，这就为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进道路。但是，要使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真正充满生机与活力，也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真正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有赖于我们更加坚定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解放思